

颛臾国是个古老的风姓小国,周初成功上位,被周天子封为“东蒙主”,代天子主祀蒙山,奠定了绵延流长的蒙山文化。王权衰微,权臣当道,孔子为它打抱不平,“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”、“吾恐季孙之忧,不在颛臾,而在萧墙之内也”的名言,让历史永远记住了颛臾的名字。

主祀蒙山 自己成了蒙山神

颛臾国,风姓四国之一,是大昊伏羲氏的后裔,与几个兄弟国一样,都有“司太皞与有济之祀,以服事诸夏”的职责。不过,大概是地理位置的原因,颛臾国又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使命。

虽说颛臾国出名是在周朝,但是颛臾部落活跃于鲁南大地,至少可以追溯到夏朝时期。西周初年,周成王将其封为诸侯国,国君为“颛臾王”,同时命其主祭蒙山。

这项任务可不得了。原始社会时,人们认为万物皆有神灵,尤其是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山、大水,更是神中之神。因此,早期的部落首领都有亲自祭祀山神的习惯,后来疆域大了,首领们跑不过来,就在当地找些靠谱、放心的土著代为祭祀。因此,颛臾国主祭蒙山,实际上是替周天子祭祀蒙山,足见其对颛臾国的信任。

蒙山可是一片连绵不绝的大山,山区面积达1125平方公里。在当时的山东地区,蒙山神的地位仅次于泰山。守着这样的神山,颛臾国倒是兢兢业业,一丝不苟,一年四时设祭,岁岁不绝。蒙山周围至今还流传着歌颂颛臾王的传说和诗文:“天旱了他为老百姓向天祈雨;老百姓有病,他用山上的草药为老百姓治病;外敌入侵,他的家人英勇作战,壮烈殉国。”

《平邑县志》载:“颛臾王世守蒙阳,君长斯民,善政善教,民爱戴之如父母。王薨,葬于蒙阴,岁时墓祭,民哀怜之如考妣。”由此可见,当时的颛臾国内,国君有德,百姓安居乐业,一派祥和景象。

有意思的是,本来颛臾王是主祭蒙山的,可由于颛臾王在人们心中的威望很

【山东古国系列之三十五】

巍巍东蒙主,孔子曾竭力维护 颛臾国:

□张九龙

高,去世以后,蒙山周围的人们历代都祭祀他,甚至把颛臾王当成蒙山神,列入朝廷定制。颛臾国祭祀蒙山地在今蒙山主峰脚下古蒙祠,宋宣和年间起,蒙山南麓的玉虚观(今万寿宫)道士兼祭蒙祠。宣和五年(1123年),宋徽宗封颛臾王为英烈昭济惠民王,从此,蒙祠改祀颛臾王,祠名改为英烈昭济惠民王庙。明洪武三年(1370年),朱元璋下诏去除山川神祠历代封号,颛臾王庙官方祭祀遂废。洪武之后,民间祭祀仍延续。

夫子一怒 难改季氏伐颛臾

进入春秋时期,实力弱小的颛臾国自然不可避免沦为大国附庸,全仰仗鲁国老大哥护其周全。可是好景不长,鲁国自鲁文公后,就由国内的大贵族季孙氏执政。尤其是到鲁哀公时的季康子这代,季康子的名位虽

是卿大夫,实际权倾朝野,鲁国国君只不过是傀儡而已。

当时鲁国的费邑,也就是今山东费县一带,是季康子的私邑。季康子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,想吞并距离费邑西北约七十里的颛臾国。于是便引出了《论语》中“季氏将伐颛臾”的故事。

孔门弟子冉有和季路当时都是季康子的家臣,在一次交谈中,无意间把季氏将伐颛臾的消息透露给了孔子。没想到,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恼火。众所周知,孔子一贯主张治国以礼、为政以德,他认为颛臾国是周代先王任命的东蒙之主,有着名正言顺的政治地位,而且,当时颛臾国已在鲁国境内,对鲁国不构成任何威胁。更重要的是,颛臾国对鲁国素来谨守君臣关系,“是社稷之臣也”,没有攻打它的理由。

面对老师的质疑,冉有一脸无辜地说:“季孙要这么干,我们两个做臣下的都不愿意,但没办法啊。”这下子,孔子更生气了,掉转话锋,将这俩爱徒一通狠批。“冉有!”孔子呵责道:“周任有句话叫‘能施展才能就担任那职位,不能胜任就该辞去。’如果盲人遇到危险却不去护持,将要跌倒却不去搀扶,那么盲人的向导有啥用呢?况且,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跑出,占卜用的龟甲和祭祀用的玉器却毁坏在匣子里,这是谁的过错呢?”

见二人大气不敢喘,孔子语气稍微缓和:“丘也闻有国有家者,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,和无寡,安无倾。夫如是,故远人不服,则修文德以来之。”

孔子语重心长地表示,如今冉有和季路辅佐季孙氏,远方的人不归服,却不能使他们来归顺,国家四分五裂却不能保持稳定统一,反而策划在境内兴起干戈,必然不会有好下场。

孔子虽然发出了“吾恐季孙之忧,不在颛臾,而在萧墙之内也”的预警,却并未能改变季康子的决策,最终季康子还是出兵了。从季康子到战国末,所有史料未再提及颛臾下落,从侧面说明颛臾在此次军事冲突中被吞并。

三代为将 为大秦打下江山

从平邑县城东行14公里,就是北依蒙山、南临浚河的颛臾故城遗址了。故城大体呈正方形,南北长600米,东西宽550米。虽经数千年的磨蚀,其轮廓至今仍然清晰可见。

故城城墙是用当地最常见的黄土夯筑而成,现在,南面城墙残存较少,东、西、北面残墙高3到4米,最高处达9米,基宽达12米。残墙夯土层次分明,对研究当地文化、建筑等方面的历史变迁有极高的实物价值。遗址内文化堆积厚约2米,文化遗存极其丰富,残砖断瓦俯拾即是,出土过春秋夹砂灰陶鬲及泥质灰陶豆等文物。

总体来看,颛臾国位于蒙山西南麓,疆域范围相对较小。根据历代文献中关于颛臾及颛臾王庙的记载,可以推知颛臾国疆域主要位于今平邑县中部、费县北部和蒙阴县西南大部分地区。其东边最远可达今费县、沂南、兰山交界处,西部到达今平邑、泗水、新泰交界处,东西长约七八十公里;南边到今平邑张里、流峪,北边到今蒙阴联城北,南北宽约四五十公里。

紧靠颛臾故城遗址,仅一路之隔的村落叫固城村,据传是因颛臾故城旧称“固(垆)城”而得名。另外,在固城村西南、县城东4公里处的颛臾村,今为颛臾社区之地,传为古颛臾后裔在国家被灭后迁居于此。

清代文人杨仪廷在《吟怀古迹》诗组中对颛臾故城遗址是这样写的:“颛臾城畔旧经过,北望东蒙古意多。臣向鲁邦称社稷,国先夏甸辟山河。繚垣岁久成虚陇,野径春深秀麦禾。借问后来畴作主?白云终古满岩阿。”

颛臾国被认为是盛产武将的蒙氏发祥地。清朝王相《百家姓考略》指出:“蒙,系出东蒙氏。秦有蒙恬,世为上将。”在各地的蒙氏家谱中,蒙骜、蒙武、蒙恬、蒙毅等都赫然在列。颛臾国虽然没能撑到最后,但是,它的子孙后裔中,蒙氏家族三代为秦将,战功卓著,为秦统一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,也算是将颛臾族人世代传承的古蒙山精神发扬光大了。

【消失的古县】

“千古奇丐” 出堂邑

□张永红

1950年底,一部叫《武训传》的电影轰动全国,也让人记住了堂邑这个地方。但1956年山东进行行政区划调整,堂邑县建制被撤销,存在了1370年的堂邑县彻底从山东省的版图上消失了,只剩下改为堂邑镇驻地的旧县城。

武训,堂邑县柳林镇(今属冠县)武庄村人,是著名的贫民教育家、慈善家。因在家中排行第七,故名武七,“训”则是清廷取“垂训于世”之意,嘉奖他行乞兴学时所赐之名。自年轻时起,武训以行乞的方式集资兴办义学。30年间,武训乞讨的足迹遍及冀鲁豫苏等省。最终修建起三处义学,购置学田三百余亩,积累办学资金达万贯,创造了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迹,被称为“千古奇丐”。武训病逝后,清廷封其为“义学正”,为其修墓、建祠、立碑,其事迹被编入《清史稿》,是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第一人。

1950年底,由孙瑜导演,著名影星赵丹主演的电影《武训传》公映,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。然而,半年之后,形势急转直下。1951年5月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《应当重视电影〈武训传〉的讨论》。中央派出以袁水拍、钟惦棐、李进(即江青)等13人组成的调查团,到武训家乡堂邑等地进行调查,写出了《武训历史调查记》,并在7月份的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。《武训传》开始在全国遭受错误性批判,孙瑜、赵丹被迫写出检讨。堂邑也因这场风波而引人注目。

堂邑县历史悠久,其历史可追溯到汉代。封邑制是封建社会帝王赐给诸侯、功臣以领地或食邑的一种重要制度。汉高祖五年(前202年),刘邦登基后大封天下,封陈婴为堂邑侯。隋开皇六年(586年)始置堂邑县,沿袭其西北原有“汉代堂邑”而得名。县治故址在今聊城市东昌府区堂邑镇西北5公里的千户营村(今属冠县)。宋熙宁初年(1013年),黄河溃决,堂邑城毁,县治迁至现址,即今聊城市东昌府区堂邑镇。相传当年城墙修缮之日,无数白麻雀翔集上空,因此,堂邑城又有“白雀城”的美称。

1943年,为纪念行乞办学的武训曾改名为武训县。1949年复名为堂邑县,属平原省聊城专区,1952年归山东省聊城专区,其辖区范围在今冠县东部和聊城东昌府区西部、北部一带。1956年3月,山东省调整行政区划,堂邑县建制被撤销,其辖地中的柳林区、辛集区和温集区的定远寨、范王庄、黑周三个乡划归冠县,城关、斗虎屯、梁水等四个区划归聊城(今东昌府区)。至此,存在了1370年的堂邑县彻底从山东省的版图上消失了,只剩下改为堂邑镇驻地的旧县城。

历史上的堂邑县虽地域不大,却是人杰地灵,人才辈出。除“千古奇丐”武训外,还有清末农民起义英雄宋景诗。宋景诗,堂邑县西北小李贾庄人,距武训的家乡仅七里之遥。他在清朝末年参加白莲教起义,创建黑旗军,率部辗转在直隶、鲁、豫交界处的多个县,配合捻军,在曹州(今菏泽)击毙清军首领僧格林沁,大败清军。1955年,根据宋景诗事迹改编,由郑君里导演、崔嵬主演的电影《宋景诗》在全国上映,同样轰动一时。明朝时期,堂邑曾先后出过四个官至大臣的进士,一时传为美谈。元代政治家、文学家张养浩曾于元大德九年(1305年)任堂邑县尹。在任三年,惩处强盗,清理冤狱,保境安民,受到民众拥戴。

堂邑现有建于金大定元年(1161年)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——堂邑文庙,是鲁西地区保存较好的古文庙建筑群。抗战时期,“山东堂邑武训中学”曾设于此。尤其是古城东南角尚存一段修筑于宋熙宁年间,长100余米、高5米多的古城墙遗址,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昔日千年古县的辉煌。

【老照片】

四十年前的知青照

□王秀君

1976年10月,刚刚17岁的我高中毕业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,国家依然还实行着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政策。于是,我们应届毕业生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,顺应时代的“大潮”,来到了历城港沟公社田庄大队一个小村庄插队落户。

我们一起下乡的知青被分配到各个生产小队,和社员一道下地劳动,整天忙碌在田间地头,种麦、收秋、挖河、修渠、锄地、捡大粪等,虽然生产环境很艰苦,倒也乐在其中。

因为我是共青团员,就担负起知青组副组长的任务,厨房记账、到村里粉坊换粉皮等任务也落在了我身上。那年冬天,农村正在大兴“农业学大寨”活动,村子里的青壮年劳动力都拉到村外修梯田,我们留在家里的女知青就成了“伙头军”,负责往工地上送饭。我担着两大铁桶菜,同几名知青提着雪白的馒头,送到村外十余里的学大寨修梯田工地。当时,身材瘦小的我,肩负四五十斤大铁桶,摇摇晃晃地行进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,坚硬的扁担磨着我稚嫩的肩膀,也在考验着我的意志。当看到修梯田的乡亲们吃着我们送去的热乎乎、香喷喷的饭菜,一路上的颠簸和劳累也化作一缕云烟飘散而去。

在随后的日子里,我被大队选拔到村里的小工厂劳动。这是家村办企业,主要是搞机械加工弹簧和农具等产品,我在小工厂干过收款、电气焊等工作,也学了一身维修手艺。再后来,我还兼任过田庄小学数学课的老师,并代表我们知青点参加了历城县的知青代表大会,在会议上还做了典型发言。

1977年,根据我的表现及招工政策,我有幸返回省城济南,到济南制鞋一厂工作,结束了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涯。同年7月,我和几位新来的知青一起合影留念。(前排右二为作者)

